

# 社会运动、 政治暴力和国家

## 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比较分析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STAT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TALY AND GERMANY  
DONATELLA DELLA PORTA

[意] 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 著

王涛 江远山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507358

# 社会运动、 政治暴力和国家 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比较分析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STAT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TALY AND GERMANY

DONATELLA DELLA PORTA

[意] 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 著

王涛 江远山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馆藏



淮阴师院图书馆 1507358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运动、政治暴力和国家: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比较分析/(意)德拉波尔塔(Della Porta, D.)著;王涛,江远山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Stat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taly and Germany

ISBN 978-7-208-11113-4

I. ①社… II. ①德… ②王… ③江… III. ①社会运动-对比研究-意大利、德国-1960~1990 IV. ①D754.65 ②D75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4910号

责任编辑 徐晓明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社会运动、政治暴力和国家

——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比较分析

[意]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 著

王涛 江远山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0.75 插页 4 字数 293,000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113-4/D·2186

定价 45.00元

## 译者序

“这是一个警察国家!”在1967年6月2日学生本诺·奥内佐格(Benno Ohnesorg)被便衣警察枪杀之后,左翼期刊 *Konkret* 主编乌尔丽克·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愤怒地谴责道。尽管迈因霍夫的谴责是一时的激愤之语,但也确实一定程度上描述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阿登纳保守主义时代奠定的威权共识民主体制(the authoritarian and consensus-based democracy)处理学生抗议与社会运动的基本态度与手段。虽然在二战结束之后,联邦德国在盟军占领下制定了新的《根本法》(*the Basic Law*),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宪政改革<sup>1</sup>,但为了尽快在战争废墟上实现社会和解、凝聚共识和进行重建,仍然有不少前纳粹党员得到新政府任用,去纳粹化的工作并未彻底进行下去。对于纳粹历史及其政治文化没有进行深入持久反省的一个结果便是,政府当局缺少应对社会异议和反对力量的包容性与灵活力,尤其是面对民众抗议和社会运动之时往往沿用纳粹时期的威权主义做法。<sup>2</sup>除了奥内佐格之死以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反对联邦德国重整军备以及有关劳工问题的抗议游行中,也曾有抗议者被警察杀害。<sup>3</sup>

与联邦德国相似,在经历过法西斯主义并在战后确立宪政体制的意大利,政府在处理工人运动以及其他民众抗议时所采取的方式也基本是暴力镇压,政府当局甚至允许警察使用枪支对付抗议者。如本书提到的,在1948年意大利制定的一项处理公共秩序的法令中,这样写道:“对那些看起来非常危险、煽动他人使用暴力的人以及示威头目,应该直接开

火。”<sup>4</sup>在意大利的五十、六十乃至七十年代，国家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对抗性的。例如，“1968年，有三人在工会组织的游行中被杀，在1969年，另有三人被杀。……在1970年至1975年间，警察在干预政治集会时杀死了七个人，其中包括抗议者与过路人。”<sup>5</sup>

在六十年代，不仅是在联邦德国和意大利这样有着极权主义传统的新生民主国家，而且在被认为富有民主政治生活经验的美国，政府对待反越战学生抗议运动，也是运用警察进行强力镇压。例如，“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5月4日，国民警卫队开枪，致使4名学生死亡，9人受伤；5月14日，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州立学院，警察杀死2名学生，打伤9人；接下来的一天，在伯克利，警察朝50名至100名示威游行开者开枪，杀死1人。30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在伯克利停留数周进行巡逻；大约有100人在这些事件后的一周内被逮捕。”<sup>6</sup>

无论是在德国和意大利，还是在美国，国家与社会运动之间的此种对抗性关系，都是在1968年学生运动后期的左翼政治暴力浪潮之中达到顶点。前面提到的迈因霍夫，后来成为德国恐怖组织“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以及“赤军旅”的领导人（参见本书第四章）。在意大利，影响最大的恐怖组织是“红色旅”，在美国是“气象地下组织”。<sup>7</sup>

随着时间发展，在左翼恐怖组织为他们理解的革命事业而用暴力回击国家的不正义之时，作为左翼恐怖组织对立面的国家制度体系及其应对策略在宪政框架之下进行了深刻调整，而且作为左翼恐怖组织基本背景的左翼——自由主义运动，也震惊于一次次暴力血腥事件，进行了深入反省，并经历分化。起始于六十年代的抗议周期，在九十年代趋于结束之时，左翼恐怖主义已经完全衰落乃至最终消失，国家制度体系在调整中变得更加开放、包容和具有回应性。左翼——自由主义运动家族在随后的一波波社会运动中则走向温和、务实和富有建设性，并且与国家制度体系建立起沟通、合作关系，从过去的“非常态规范政治”成为民主社会中“常态、规范政治”的一个部分。

在六十年代末期学生运动中出现、并在七十、八十年代中后期衰落的左翼——自由主义运动家族中出现的政治暴力现象就是本书——《社会运动、政治暴力和国家》——的研究对象。由于战后德国和意大利政治社会

状况的相似性,本书集中于对德国和意大利案例进行跨国比较研究,致力于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政治冲突正是在那些似乎已被福利国家的许诺和劳资冲突的制度化所安抚、平定的社会中走向激进的?为什么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安宁和富足中通过社会化进入政治生活的那一代人会诉诸暴力?为什么在‘第一世界’中,警察会被命令向政治示威者们开枪射击?”

本书作者是意大利知名政治社会学家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Donatella della Porta)教授。她任教于欧洲大学学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政治与社会学系和佛罗伦萨大学(The University of Florence)政治学与社会学系,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运动、政治暴力、恐怖主义、政治腐败、警察和公共秩序政策,撰写过多部学术著作、论文和研究报告,主编或合编过数十部学术论文集,主持过多项有关欧美社会运动的重要课题。同时,她还是《欧洲政治学评论》(*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等多家重要学术期刊的编委。除了本书之外,她的其他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有:《社会运动:导论》(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ario Diani,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6);《跨国抗议和全球行动主义》(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S. Tarrow eds., *Transnational Protest and Global Activism*,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管制跨国抗议》(Donatella della Porta, A. Peterson and H. Reiter eds., *The Policing of Transnational Protest*, Aldershot, Ashgate, 2006)等。

在作者撰写本书之时,政治暴力研究主要是在恐怖主义研究和社会运动研究这两个领域之中进行。然而,恐怖主义研究在处理政治暴力之时,往往关切的是形式最为激进的政治暴力类型,而且要么过于强调恐怖主义者的“病态个性”和“冷血阴谋”,忽略政治暴力得以产生的政治体制背景,要么执着于宏观体制与社会条件分析,忽略研究那些运用政治暴力的集体行动者的动态演变。社会运动研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省并改进了恐怖主义研究在分析政治暴力问题上的理论假设、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社会运动研究运用“资源动员”、“政治机会结构”等理论方法,把社会运动看作是理性的集体行动者,它们为了追求实现自身的目标而调动各种资源,在与社会条件、政治体制的相互作用之中进行自我调整和动

态演变。但长期以来,政治暴力研究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一直处在边缘地位,既缺少成熟的概念与方法,而且很多相关理论问题也未得到深入研究。在这一背景下,本书立足于社会运动理论,并采用组织理论、符号交互理论等多学科的方法,对左翼政治暴力现象做出了开拓性研究。

作者的理论抱负是贯通社会运动分析的三个层次,即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分别考察这三个层次涉及的社会环境条件、团体动力和个人动机,并以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把体制、组织和个人的视角都考虑在内的整合模型。在宏观层次的分析中,作者采用了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把导致政治暴力的激进化过程置入国家策略与社会运动策略间的相互作用之中进行考察,并集中分析了与政治暴力的出现有直接关系的“抗议管制”。在中观层次上,作者运用了组织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来分析社会运动内部的结构关系以及运动团体为获得动员而相互展开的资源竞争,重点分析了组织动力。在微观层次上,作者考察了与运动积极分子激进化有关的社会网络、激励因素以及对组织的投身,把运动积极分子的激进化过程理解为一个认知框架、身份意识、投身程度在国家与社会运动的相互作用之中不断建构的过程。一方面,作者希望通过贯通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三个分析层次,为了为政治暴力现象提供整体性解释;另一方面,作者还希望通过这样一项沟通了宏观条件与微观条件的研究,为拓展社会运动研究做出典范。

本书的研究方案是跨国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是德国和意大利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社会运动中出现的左翼恐怖组织及其政治暴力现象。作者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国家作为研究案例,是因为它们在诸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首先,这两个国家有相似的现代化过程,都经历过纳粹历史,又都是在极权主义崩溃之后,通过宪政民主改革,建立了相似的政治制度;其次,从政治机会结构的方面来看,这两个国家有着相似的议会民主制、比例选举和强大的左翼政治力量,而且这两个国家都有着对社会反抗运动进行镇压的政治传统;最后,在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这两个国家政治氛围的变化基本一致,而且社会运动的起伏阶段以及所出现的政治暴力形式也都是相似的。正是此种相似性,有可能使跨国比较研究得出有限范围内政治暴力现象(即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晚期新社会运动发展

有关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暴力)的结论。作为对左翼政治暴力的原创性研究,本书所使用的基本上是相关的原始资料,这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提供了保证。作者在搜集、判别原始资料上付出的努力以及表现出的谨慎是值得国内社会运动研究者注意。作者使用了激进组织之外的资料(警察机构与司法机构资料以及媒体资料)以及激进组织之内的资料(即口述史、传记和访谈等材料),针对不同分析层次的不同需要,在一方资料具有的偏颇方面,运用另一方资料来权衡和补充。例如,在研究激进组织的内部结构时,作者同时使用了法庭庭审记录、官方档案和针对前激进分子的访谈等。正是这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以及作者对资料的谨慎运用,使得本书贯通三个层次的分析成为可能,并让作者富有节制的相关结论拥有经验依据。

通过对宏观层次的外部条件、中观层次的组织动力和微观层次的个人认知与动机,作者对这三个层次在政治暴力的产生、发展、激进化以及消退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一个整体观点。她认为政治暴力周期演化的每个阶段中,都有一个层次在发挥着主导作用:首先,政治暴力在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上的出现是受到宏观层次的政治与社会条件的影响;其次,在政治暴力发展起来之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作为暴力倡导者的团体动力,进而又影响政治暴力在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上的发展;最后,在政治暴力周期快结束之时,微观层次上的个人认知与动机对政治暴力的发展发挥了最终的影响。

具体而言,就宏观层次来说,作者通过研究发现,尽管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体制在总体上为政治暴力的出现营造了宏观背景,但政治暴力是否发生却与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体制并没有直接关系,它主要是由社会运动与国家关系中的抗议者与作为抗议管制者的警察之间的直接互动引发的。她认为,在德国和意大利,政治暴力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这两个新生民主国家的政治精英不情愿整合与容纳来自社会运动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进而只是在经历多年较为艰难痛苦的激烈冲突与暴力现象,扭转了基本政治力量格局以及政治精英对民主权利有了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理解之后,政治暴力在社会运动被整合入“常态规范政治”中才得以消失。就中观层次来说,她的研究表明以往研究激进政治组织的“工具主义视



角”和“组织视角”皆有缺陷之处，激进政治组织使用政治暴力既不像前者所说完全是为改变生存环境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也不像后者认为的那样来自于为暴力辩护的激进意识形态，而是与警察的斗争之中，在不可控的外部压力与内部资源竞争的影响之下，逐步削弱“内在关切”且增强“外部关切”而选择暴力手法。由此，她提醒把意识形态的作用同激发成员投身于组织目的结合起来考察。就微观层次而言，她在清理了研究激进积极分子的精神病理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不足之处后，认为运动积极分子往往是在同志—朋友关系网络的情感纽带、对外部现实的认知框架以及对自身暴力行动的自我解释的变动之中逐渐构建出新的集体身份——“自由战士”。所以，作者认为，正如政治暴力本身是三个层次原因在不同时期共同作用之中产生、发展和衰落的一样，政治暴力也只有通过贯通这三个层次才能得到全面、深刻的解释。

本书出版之后，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学者一般认为本书的优点集中在四个方面：(1)该书立足于社会运动理论，从社会运动背景考察了政治暴力现象，进而把政治暴力现象拉回到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的焦点；<sup>8</sup>(2)本书运用政治过程理论及其政治机会结构概念把社会运动置入政治制度领域当中进行考察，并研究了直接影响到政治暴力的“警察”；<sup>9</sup>(3)本书通过对德国和意大利案例的比较研究，打破了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的学科界限，在其间建立了沟通的桥梁；(4)本书突破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束缚，将集体行动的分析置入历史之中进行考察，对组织动力以及激进分子提出了新的解释。然而，也有不少论者指出了本书的不足之处：(1)本书的理论抱负过大，仍然避免不了宏大叙述，尤其是在微观层次的分析中，很多在理论上并没有直接关系的现象被置入“微观叙述”之下，例如作者并未清楚地对“网络结构”和“集体持有的解释”之间的联系做出充分解释；<sup>10</sup>(2)本书所使用的理论以及所要批评的理论过多，而且对这些理论的每次讨论都并不充分，例如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反驳与批评并不深入、充分；<sup>11</sup>(3)作者用对政治体制与社会运动关系变迁结果的“事后描述”来说明政治暴力现象的产生，认为运动走向激化的原因是运动积极分子无法接触到政治决策者或没有被整合入政治体制，而导致政治暴力现象的激进学生来自于大学，大学本来就不是与政治体制有紧密联系的地方，由此作者

对政治暴力之产生的解释过于简单化;<sup>12</sup>(4)正因为本书是立足于社会运动理论,从而对社会运动背景的描述是极为丰富的,但对作为社会运动对立面的政治体制本身的变动与调整的政治学分析极为不够,而且缺少对民主化过程自身的解释。<sup>13</sup>总体上,学者们认为,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之中,本书对政治暴力现象做出了卓越的、开拓性的研究。

本书翻译由王涛、江远山合作完成。江远山翻译第五、六、七、八章,王涛翻译第一、二、三、四章以及其余所有内容。在初稿完成后,两位译者分别校译了对方译文;在校译后,两位译者又各自进行了修改;在校译全部完成后,先由江远山统校部分译稿,最后由王涛统校全部译稿。

在此,我们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范蔚文先生的支持、徐晓明先生的推荐以及在翻译过程中的督促;还要感谢德国马堡大学哲学系李鹃博士,她帮助翻译了相关德语译名,感谢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徐卫翔教授,他帮助翻译了部分意大利语译名。需要提及的是,尽管译者的翻译态度是认真与谨慎的,但翻译之中的错误难免,我们真诚地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

## 注 释

1. David Art, *The Politics of The Nazi Past in Germany and Austria*,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 51.

2. Nick Thomas, *Protest Movements in 1960s West Germany*, Oxford: Berg, p. 24.

3. Donatella della Porta, *Social Movement, Political Violence and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64.

4. Ibid., p. 59.

5. Ibid., pp. 59—60.

6. Ibid., p. 231, 注释 18.

7. 关于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左翼恐怖组织,近年来有一些电影作品。关于德国“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电影《赤色风暴》(*The Baader-Meinhof Complex*),导演是乌利·埃德(Uli Edel),德语,2008年;关于意大利“前线”组织:电影《前线》(*La Prima Linea*),导演是雷纳托·德马里亚(Renato De Maria),意大利语,2009年;关于美国“气象地下”组织:纪录片《气象地下组织》(*The Weather Underground*),导演是萨姆·格林和比尔·西格尔(Sam Green and Bill Siegel.),英语,2002年。

■ 社会运动、政治暴力和国家

8. 也可参见 Robert W. White,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26, No. 4 (Jul., 1997), pp. 470—471.

9. 也可参见 Elizabeth J. Per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0, No. 1 (Feb., 1998), pp. 284—287.

10. Klaus Eder,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3, No. 1 (Jul., 1997), pp. 264—266; Elizabeth J. Per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0, No. 1 (Feb., 1998), pp. 284—287.

11. Joseph La Palombar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1, No. 4 (Winter, 1996—1997), pp. 709—710.

12. Ibid.

13. Christian Davenpor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 1997), pp. 979—981.

## 中文版序

2001年9月11日,纽约。9月11日的袭击——经常作为“September 11th”或“九·一一”而被提及——是基地组织在2001年9月11日策划的一系列自杀性袭击。当天上午,十九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民航客机。劫持者有意图地用其中两架客机撞击纽约世贸大厦双子楼,客机上所有乘客以及大量在双子楼中工作的人员遇难。双子楼在两个小时之中垮塌,并摧毁了附近大楼,损及其他一些建筑。劫持者用第三架客机撞击了位于首都华盛顿周边阿灵顿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在恐怖分子重新把航向定位于华盛顿,打算把国会大厦或白宫作为目标,一些乘客与乘务人员企图重新夺回飞机控制权之后,第四架客机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坠毁。在所有这些航班中,没有生还者。在此次袭击中,大约有3000名遇难者,并有19名劫机者死亡。(引自 Wikipedia,“九·一一”事件词条)

2011年7月22日,挪威。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生于1979年2月13日。他是挪威右翼极端分子,承认他本人就是挪威两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凶手:奥斯陆政府办公大楼爆炸,导致8人死亡;在特岛工党工人青年团夏令营地上的大规模枪击,导致69人死亡。在袭击前六个小时,布雷维克还在 YouTube 上发布视频,呼吁保守分子“拥抱殉道”。他还呼吁进行一次欧洲反穆斯林的十字军东征。布雷维克承认并声明,袭击目的是把挪威与西欧从穆斯林的占领中拯救出来。(引自 Wikipedia,“Anders Behring Breivik”词条)

这两起事件与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和德国的政治暴力有什么共同之处？无疑，它们所指向的都是以最为极端形式表现出的政治暴力：小规模地下团体（甚或单个人）以政治目标为取向（多少是得到声明的）而谋划的屠杀。然而，毫无疑问，其中存在很多差异。“九·一一”是逐渐为人所知的“宗教极端主义”所制造的巨大事件。显然，最近在挪威的悲剧袭击事件是激进右翼“单独行动者”（lone-wolf）所犯下的罪行，他宣称自己想要保卫西方文明。这两起事件，加之本书要研究的意大利和德国的政治暴力，都涉及了规模不同的秘密组织（从数十人的武装分子到数千人的武装分子）、活动持续时间、结构（从松散组织到广泛网络），以及大不相同的动机与意识形态。这些团体都使用了政治暴力，尽管烈度不同。

实际上，导致这些事件的现象已经在社会科学中，进而在不同的子学科中，被人们通过运用非常不同的理论方法研究过。例如，左翼政治暴力被人们置于长期冲突（long-lasting conflicts）的范畴中，而在这种情况下，与政治暴力的其他形式相比，左翼政治暴力更经常地是在考察导致阶级分裂的社会与政治转变的社会运动理论方法之中得到研究。即便左翼政治暴力中暴力手段的运用常常受到谴责，而且被认为最终是无效的，但有关左翼形式和民族—国家形式政治暴力的研究，往往强调这两种形式与合理冲突（legitimated conflicts）（即便是升级的）之间的联系。相反，激进右翼则更多地被作为对既定社会纽带与规范体制（normative systems）之崩溃的非理性反应而被分析。相似地，以宗教为取向的当代暴力，主要被看作是现代化尝试之失败的一个结果。

甚至不仅如此，在某些解释之中，来自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政治暴力，被认为是极为特殊的：它是非常邪恶的、残酷的，诸如此类。

- 人们认为恐怖主义的新的宗教形式，不但更加致命，而且更加不分青红皂白。人们认为，它们所运用的是某些极为致命的暴力手段 [例如，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或放射武器）]；
- 同时，它们的目标被认为是绝对的、没有谈判余地的。实际上，人们认为，所谓的宗教信仰极端性正是“新恐怖主义”特征的原因；

- 由于它们的目标包括了摧毁对手,即西方文明,因而它们不但是激进的,而且是全球性的;
- 新的恐怖主义者被赋予这样一些动机,比如狂热、愤怒、病态残忍、偏执(Laquem 1999);
- 人们认为,新恐怖主义所具有的极为松散的网络,以及它们对新通讯技术的使用,使它们更加危险(Simon and Benjamin, 2000)。

然而,“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行动形式”,是一个需要在经验层次上提出的问题。事实上,有关恐怖主义新形式的许多观点是存在争议的。在深入分析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基础上,波普认为,在自杀式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激进主义之间,很少存在联系,因为恐怖主义运动以战略目标而非宗教目标为导向(Pape 2005:4)。从黎巴嫩到以色列、斯里兰卡[世俗化的泰米尔猛虎组织——LTTE——实施了大量自杀式袭击]、克什米尔和车臣,每个恐怖主义运动的发动者都是那些通过迫使民主政权从他们宣称的领土上撤出,尝试建立或维持政治自决的恐怖主义团体。

所谓恐怖主义日益增强的致命性,也被人们否定。恐怖主义袭击的物质后果往往是有限的:只有少数袭击造成了超出100人死亡的结果,而且迄今为止,这样的袭击仍旧少于50起。同时,秘密暴力在中心和范围上相当不同:2004年的马德里大屠杀(191人死亡)和2005年的伦敦大屠杀(52人死亡)与以往的屠杀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同过去由激进右翼策划的屠杀事件[1980年的博洛尼亚(Bologna)火车站炸弹袭击,大约100人死亡]相比。

此外,伊斯兰激进团体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而是具备战略区分的(strategic discrimination)。这有一些例证。例如,伊斯兰地下组织没有使用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比如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相反,1995年3月,日本真理教在东京使用了沙林毒气。在20起极为致命的袭击中,只有9起被归类为纯粹宗教性的。正如佩普(pape 2005)所言,在黎巴嫩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中,只有21%的人是伊斯兰激进分子,而71%的人是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8%的人是基督教激进分子。

在目标方面,把“新恐怖主义”定义为宗教性的,同样是有争议的。正如卡瓦诺(Cavanaugh 2009)所观察到的,在宗教意义上理解的恐怖主义,

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各不相同,而且对宗教暴力神秘化的现实建构促使人们创造出—个被打上烙印的宗教他者。(Cavanaugh, 2009)但是,实际上,新恐怖主义者通常都是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心理病症。另外—项观察是,恐怖主义新近的形式,如同过去的形式—样,都拥用地方根源。在最开始时,基地组织声称他们的目标是把美国军事力量从穆斯林领土上赶走,他们当时引用了越南和黎巴嫩的例子。(Crenshaw 2010)

至于组织分权问题,人们提到,只有基地组织具有松散的全球网络,而且也只是在其发展的部分时期之中如此,因为它是从—个相当集权化的组织结构起家。我们也可以想起,过去的恐怖主义远远不是同质性的(例如,无政府主义团体),它们也推广由自治的小组织构成的松散网络。

同时,通过参考社会运动研究,人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新近出现的秘密暴力形式。首先,最重要—点是,本书提出的研究已经表明,政治暴力经常在抗议浪潮之中扩散。政治暴力是在社会运动之中发展起来的,而且政治暴力实际上是社会运动的副产品。大多数秘密组织起源于社会运动组织中的分裂,而且大多数地下组织的武装分子拥有参与社会运动组织的经历。社会运动是由个人和组织构成的网络,具有共同的身份以及相互冲突的目标,而且这些个人和组织往往使用非传统的行动手段。(della Porta and Diani 2006, chap. 1)尽管他们很少倡导暴力,但是他们却使用时常会导致事件升级的抗议活动的破坏性形式。此外,在特定历史情境中,抗议的某些形式被认为在本质上是暴力的。政治暴力是集体行动形式所具有—种手法,它包括大量地使用武力,而主流文化将之谴责为非法。

尽管社会运动与秘密政治暴力之间的联系曾被人们注意到,但只有少数社会运动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运动中的激进化过程,并把这些过程同社会运动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集体行动者的转化(Wiewior-ka 1993)、排他性身份的建构(Goodwin 2004)联系起来。根据杰伦·冈宁提供的数据(Jeroen Gunning 2009),对两份恐怖主义研究的核心期刊上1569篇文章进行关键词“社会运动”的搜索,只找到17篇类似主题文章;在IBSS数据的“社会运动”条目下搜索“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者”,虽然找到81篇文章,但大多数都是在2000年后发表的。然而,中东地区

的秘密政治暴力研究者却能够越来越多地参考社会运动研究(例如, Wiktorowicz 2004; Gunning 2007; Hegghammer 2010; Alimi 2007)。同时,这个领域的发展空间仍旧是巨大的,因为“社会运动研究者很少谈恐怖主义,例外情况不多”(Goodwin 2004, 260),事实的确如此。

近来一些研究似乎证实了我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和德国政治暴力研究中所提出的见解。实际上,一般来说,他们证实,关注更广泛的组织领域(包括武装团体,而且也包括非政府组织、政党、工会,甚至是政治派别)对于理解政治暴力新近出现的形式特别重要。事实上,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学术分析(集中研究极端形式的武装团体)来说,社会运动研究对组织资源的强调是特别有用的。

我认为,本书除了研究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和德国左翼政治暴力的具体问题,还对理解暴力的不同历史形式提供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洞见。特别是,我要强调下述主要理论成果,它们对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极为有用。

首先,政治暴力是在各种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暴力手法是在社会运动与其对手(以及潜在盟友)之间武力的、象征性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出现并转变。各种变化是发生在社会运动与当局的遭遇之中以及它们之间的一系列相互调适中。政治暴力很少是在一夜之间或有意识地被人们采用。相反,警察与对手的反复冲突逐渐地、几乎是不知不觉助长了激进主义,最终导致暴力形式行动的合理化。同样地,秘密团体与支持性环境产生相互作用。在这一支持性环境中,秘密团体找到了后勤支援以及象征性奖励。(Malthaner 2011)暴力实际上拥有一个来自人际交流的关系性构成部分,而人际交互过程“促进、阻止或疏导了集体暴力,并且把集体暴力与非暴力政治联系起来”(Tilly 2003:20)。

其次,暴力是一种突生现象。暴力拥有一种因果模型无法解释的突生特征。选择暴力,是在行动中产生的。正如卡利瓦斯(Kalyvas)在其著作中针对内战问题所观察到的,“几乎关于内战的每个宏观历史解释都指出以往民众忠诚状况对战争结果的重要性,然而几乎每个微观历史解释都指向了大量的内生机制,而忠诚状况与身份是凭借这些内生机制在战争出现或者被战争剧烈地转变”。(Kalyvas 2006, p. 3)在初始的分裂、身



份与利益之外,新的分裂、身份与利益在斗争期间被创造出来,或被削弱,或被增强。动机也是在行动之中改变的,正如“常常是内战使得战前那些没有危险的、非暴力性的分裂进一步政治化了”(ibid., p. 79)。暴力获得了自身的逻辑,产生出与激发暴力时相同的极端化。用卡利瓦斯的话来说,“战争的到来,转变了个人的偏好、选择、行为与身份,而且战争发挥其转变功能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暴力……集体的与个人的偏好、策略、价值观与身份在战争过程中被持续不断地塑造与再塑造”。(ibid., p. 389)同样,在游击战运动之中,“政治文化——反叛者的诸种价值观、规范、实践、信仰与集体身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对冲突经验(即反叛者自身的反叛行动、所受到的镇压以及对事件的不断进行之中的解释)的回应之中演变。”(Wood 2003, p. 19)

再次,暴力是在象征意义上被建构起来的。暴力在认知过程与情感过程之中产生,并且它还进一步产生新的认知过程与情感过程。对于激进组织研究来说,文化过程特别重要,因为政治暴力主要是象征意义的。政治暴力往往在可以获得文化资源的背景之中发展起来;政治暴力激发起对暴力本身的激烈辩论,而且它不仅致力于物质损坏,而且还致力于制造情感效果。除了与逐渐增强曝光度相联系的工具性维度之外,直接行动对抗议者小圈子的重要影响是,通过增强团结与归属的感受来强化他们的动机。如果说,人们在过去一直带有疑虑地看待情感(不但在社会运动研究中,而且在整个政治社会学与政治科学之中,都是如此),那么对情感所发挥作用的关注在近来已经出现(或再度出现)。参与抗议事件的情感强度(Goodwin, Jasper, and Polletta 2011; Aminzade and McAdam 2001),已经同加强集体身份之中的颠覆性“反向情绪”的作用(the role of subversive “counter-emotions”)一起,得到学者的强调(Eyerman 2005)。社会运动研究最近取得的进展,也有助于分析同政治暴力之发展相伴随的具体叙述,进而提出有关象征过程的问题。对于一般抗议事件[作为一种“情感释放”的结果,参见 Flam 2005]以及重大情感事件来说,戏剧手法、叙述与仪式(dramaturgy, narrative and rituals)在加强成员投身组织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得到了研究。对于理解地下反抗组织中的激烈情感经验来说,这些因素都是特别重要的。